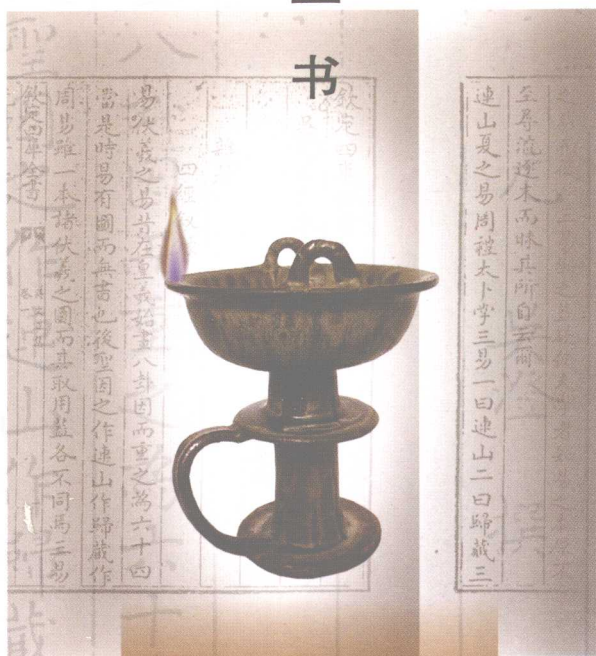


匡亚明 主编

蹇长春 著

白居易评传 (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南京大学出版社

Critical Biography Series of Chinese Thinkers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BAI JUYI

(Book 2)

Jian Changchun



Nanjing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7-305-05941-4



9 787305 059414 >

定价: 89.00元 (上、下)

白居易评传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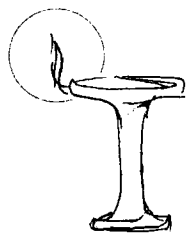
曹光甫 著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话



曹光甫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白居易评传 (下)

附 元稹评传

蹇长春 著

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居易评传/蹇长春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 - 7 - 305 - 05941 - 4

I. 白… II. 蹇… III. 白居易(772 ~ 846)—评传
IV. 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6351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白居易评传(附:元稹评传)

蹇长春 尹占华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 × 960 1/16 印张 44.75 字数 482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305 - 05941 - 4

定价: 89.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 主 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 毓 董 任天石 巩本栋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第六章 白居易的前期思想 ——激进的民本主义

纵观白居易的一生,以元和十年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其人生走向与心路历程,可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期,“志在兼济”,积极用世,其思想主流表现为激进的民本主义;后期,“行在独善”,消极退隐,其思想主流则表现为知足保和的中庸主义。

民本主义,作为我国一种古老的政治思想传统,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殷周时期。见于《尚书·五子之歌》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一语,就极其精当地揭示了它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所强调的治国必先安抚百姓的真谛。其后,孔子提倡“仁爱”、“修己以安百姓”;孟子主张“贵民”、“保民”,是民本主义的进一步发扬。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总是难以摆脱以标榜“仁政”、“德治”为核心的民本

主义思想的影响。

诚然,民本主义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临政驭民的一种“治术”,其根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治久安,但在客观上却有利于减轻被压迫人民的剥削与痛苦,充分体现出人类理性和人道主义精神。甚至可以说,它是长夜漫漫的封建专制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就其历史意义而言,它有如封建专制制度的“润滑剂”,既缓和与调节了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与对抗,从而起到了延缓专制制度衰亡过程的作用;同时,又迫使慑服于人民反抗威力的统治阶级对被压迫的劳苦大众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从而有利于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条件,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纵观我国历代封建王朝,凡是政治经济昌盛繁荣的时期,大抵也正是民本主义思想高扬的时期。以“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彪炳史册的李唐王朝,从总体上看,正是一个较好地继承了民本主义思想传统的朝代。纂集贞观时期君臣论对的史料,标榜“君人南面之术”的《贞观政要》,作为一部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政治史料专辑,由吴兢编著于开元前期,从而把“贞观”和“开元”这两个“盛世”联系起来,绝不是偶然的。

在贞元、元和之际,经由科举进入仕途的白居易,顺应从“永贞革新”到“元和中兴”,人心思治,上层统治者也力图革除弊政,有所作为的历史趋势,企图走儒家经世致用的道路,颇欲在政治上有所建树。而当时士大夫所渴望的“中兴”,不过是力求整顿纲纪,挽回国力衰飒的颓势,恢复贞观、开元时期的兴盛局面罢了。这样,既然以富有民本主义思想的贞观、开元“盛世”作为追求的政治理想,那么,促成了贞观、开元之治的民本主义,自然也就成为他所奉行的政治思想。质言之,



白居易的民本主义思想,固然远绍先秦儒家的“仁政”传统,特别是继承了孟子“贵民”、“保民”的民本思想,实则直接汲取和承袭了反映贞观、开元时期的资治经验,作为集民本主义思想之大成的《贞观政要》这部著作。这一点,只要我们将白氏早期的政论结集《策林》同《贞观政要》加以比照,就完全清楚了。举凡《政要》关于省政宽刑、轻徭薄赋,以安民为本的基本精神,均为《策林》所继承,只不过后者针对“安史之乱”后特别是德宗贞元以来,纲纪废弛,政局败坏的种种弊端,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罢了。

白居易前期的民本主义思想,除了在《策林》中有较集中的体现,还散见于其早期所作《百道判》、《为人上宰相书》;同时,也鲜明地表现在其元和前期的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比如,他在翰林学士及左拾遗任上,所作的那些不避权贵,旨在疾贪暴、活疲民的状态谏章,在倡导新乐府运动期间所作大量的“唯歌生民病”的讽谕诗,无一不闪烁着关怀疮痍、关心民瘼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光辉。

平心而论,由于受儒家“仁政”理想和民本主义传统的影响,我国历史上的文人士大夫,对于民间疾苦一般都可能表现出一些关注和同情的倾向,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像白居易在元和前期的政治实践和文学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那种“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的激切态度,“誓心除国蠹,决死犯天威”的大无畏精神,则确属凤毛麟角,罕与其匹的。这正是我们把白居易的前期思想定位为激进民本主义思想的原因所在。



一、弘扬君道，鼓吹仁政

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地主阶级同农民之间的矛盾。就其政治结构而言，也可以说是作为地主阶级总代表的最高统治者——“君”，同处于被压迫奴役的社会底层的“民”之间的矛盾。介于这二者之间的“臣”，即大大小小的各级官吏，则是行使君主的意志，对广大劳苦民众实行压迫和奴役，从而维护其专制统治的工具。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安邦治国的最基本的政治问题，不过是如何处理好上述三者之间的关系罢了。

白居易《新乐府序》，在谈到政治讽谕诗的创作主旨时，曾明确主张“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其实，就讽谕诗干预时政的目的性而言，主要是“为君”、“为臣”、“为民”这三个层面；而“为物”与“为事”，不过是前三者的延伸与具体化而已。这是白居易的激进民本主义思想在其文学实践中的反映。这种思想反映在其政治实践中也大体如此，即着眼于固本安民的根本问题，从弘扬君道、勉励臣节和关心民瘼这三个层面而具体展开的。

生活在“君本位”专制制度下的白居易，却企图通过劝导与讽谕，敦促最高统治者以德自律，以礼自修，唯度是守，树立起“民本位”的观念。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天真的幻想。但正可以由此看出，他把民本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的执着追求。



(一) 内圣外王,修身化下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路,乃是其人生追求与价值取向的最高理想。在这几个层次中,修身无疑是其根本的立足点。所以,儒家明确主张:“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所谓修身,即内修圣德,自觉地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如果一个人,在道德上臻于完善的境界,那么,他在社会政治实践中,施行仁民爱物的仁政——“王道”,便是不期然而然的逻辑延伸。这样,把这二者结合起来,就达到了虽由先秦道家学派所提出,实则为儒家奉为最高政治哲学与理想人生境界的所谓“内圣外王”。

在“朕即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下,所谓弘扬君道,首先就是要唤起唯我独尊、可以为所欲为的皇帝本人,能够意识到自身的言论行为,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兴亡,从而强化道德意识,以德自修,以礼自律,唯度是守,所谓“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礼记·大学》),力求做道德完善的楷模,遵守法度的表率。只有这样,才能塞人望而归众心,使“言出则千里之外应如响,令下则四海之内行如风”(《策林·号令》),臻于风俗淳厚,政通人和,天下大治。

《贞观政要·君道篇》在论及为君之道时,开宗明义引述太宗之言云:“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陪侍于侧的魏徵也认为,对于君主而言,修身乃“治国之要”,他引詹何对楚王之言云:“未闻身治而国乱者。”贞观初,锐意励精图治的唐太宗,在与侍臣论对中,曾多



次强调修身化下的重要。如贞观二年,他对侍臣说:“古人云:‘君犹器也,人犹水也,方圆在于器,不在于水。’故尧舜率天下以仁,而人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人从之。下之所行,皆从上之所好。”(《慎所好》第二十一)贞观四年,在谈及隋炀帝因逞欲败德,以致败亡,又加以强调说:“君天下者,唯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同上)贞观十一年,魏徵在谏疏中再次强调,对君主来说,修身化下乃治国之本,他引证《潜夫论》之文曰:“人君之理,莫大于道德教化也……是以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也。德者,所以修己也;威者,所以理人也。民之生也,犹铄金在炉,方圆薄厚,随熔制耳。是故世之善恶,俗之薄厚,皆在于君。”(《公平篇》第十六)上述思想观点,都被白居易在《策林》中充分汲取,并时有创造性地发挥。

他首先提出“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的命题,并进而指出:“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而“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其用心就在于敦促君主不但要以德自修,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同时要施仁政于民,才能收到教化的实效。他说:

人无常心,习以成性。国无常俗,教则移风。故亿兆之所趋,在一人之所执。是以恭默清静之政立,则复朴保和;贵德贱财之令行,则上让下竞;恕己及物之诚著,则苍生可致于至理;养老敬长之教洽,则皇化可升于太宁。由是言之,盖人之在教,若泥金之在陶冶;器之良窳,由乎匠之巧拙;化之善否,系乎君之作为。(《策林·策项》)

为了强化君主修身向善的自觉意识,他进一步强调指出,



君主的言动举措,密切关系到政教的兴废、百姓的祸福、国家的治乱:

教无常兴,亦无常废。人无常理,亦无常乱。盖兴废理乱,在君上所教而已。故君之作为为教兴废之本,君之举措为人理乱之源。若一出善言,则天下之人获其福;一违善道,则天下之人罹其殃。若一肆其心,而事有以阶于乱;一念于德,而邦有以渐于兴。交应之间,实犹影响……(同上)

为了敦促君主清醒地认识到“修己”与“施教”的极端重要,白居易汲取了《政要·政体篇》关于“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的观点,在《策林》八中提出了“风行浇朴,由教不由时”的命题。他说:“代之浇漓,人之朴略,由上而不由下,在教而不在时。盖政之臧否定于中,则俗之厚薄应于外也。”他引《礼记·乐记》的观点,并加以阐发:

《礼记》曰:“教者人之寒暑也,事者人之风雨也。”^①此言万民之从王化,如百谷之委岁功也。若寒暑以时,则禾黍登而菽麦熟;若风雨不节,即稂莠植而秕稗生。故教化优深,则谦让兴而仁义作;刑政偷薄,则讹伪起而奸宄臻。虽百谷在地,成之者天

^① 《礼记正义》卷三八《乐记》云:“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教者,民之寒暑也;事者,民之风雨也。事不节则无功。”按白氏引文“民”作“人”,盖避太宗讳改。



也；虽万人在下，化之者上也。必欲以凉德弊政，严令繁刑，而求仁义行，奸宄息，亦犹飘风暴雨，愆阳伏阴，而望禾黍丰，稂莠死。其不可也，亦甚明矣。故曰：尧、舜率天下以仁，比屋可封；桀、纣率天下以暴，比屋可戮。斯则由上在教之明验也。

其次，正因为君主的行为举措，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亡，白居易劝谕君主居安思危，理不忘乱，既“慎其始”，也“敬其终”。针对刚刚主持元和新政的唐宪宗，当务之急是如何塞人望、归众心，为此，提出了“慎言动之初”的命题。他说：

夫欲使人望塞、众心归者，无他焉，在陛下慎初之所致耳。臣闻天子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若王者言中伦，动中度，则千里之外应之，百代之后歌之，况其迹者乎？若言非宜，动非礼，则千里之外违之，百代之后笑之，况其迹者乎？是以古之天子，口不敢戏言，身不敢妄动。动必三省，言必再思。况陛下初嗣祖宗，新临兆庶。臣伏见天下之目专专然以观陛下之动也，天下之耳颀颀然以听陛下之言也。则陛下出一言不终日而达于朝野，动一事不浹辰而闻于华夷。盖是非之声，无翼而飞矣；损益之名，无胫而走矣。陛下得不慎之哉？……言动不苟，则天下之望塞焉，天下之心归焉。（《策林》五）

鉴于历代帝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大雅·荡》），白居易汲取《政要·慎终篇》关于魏徵针对唐太宗“近



岁颇好奢纵，渐不克终”所上“十渐疏”的思想，他敦促唐宪宗不要期望教化速成，不要满足于“小理”，而要“敬始慎终”，臻于“大治”。他说：

夫欲使政必成，化必至者，无他焉，在陛下敬始慎终之所致耳。臣闻：先王之训，不徒言也；先王之教，不虚行也。浅行之则小理，深行之则大和。浅深大小之应，其犹影响矣。然则天下至广，王化至大，增减损益，难见其形。是以政之损者，虽不见其日损，必有时而乱也；教之益者，虽不见其日益，必有时而理也。陛下但推其诚，勤其政，慎其始，敬其终，日用而不知，自臻其极。此先王终日所务者也，终日所行者也。不可月会其教化之深浅，岁计其风俗之厚薄焉。臣又闻《易》曰：“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此言王者之教待久而成也，王者之化待终而至也。陛下诚能久而终之，则何虑政不成而化不至乎？（《策林·教必成化必至》）

再次，“顺人心以立教”才能收到教化速成、不劳而治的实效。民本主义的实质和核心问题，正在于顺乎民心。为此，白居易汲取《政要·政体篇》关于“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之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的见解，向唐宪宗详细申论了以百姓之心为心，“顺人心以立教”的迫切意义：

臣闻：三皇之为君也无常心，以天下心为心；五帝之为君也无常欲，以百姓欲为欲。顺其心以出令，



则不严而理；因其欲以设教，则不劳而成。故风号无文而人从，刑赏不施而人服。三、五（三皇五帝）所以无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后代反是，故不及者远焉……后代之天下，三、五之天下也……而不及三、五者，何哉……岂不以己心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为欲，拂百姓以从一人之欲也……伏惟陛下去彼取此，执古御今，以三、五之心为心，则政教何忧乎不治？以亿兆之欲为欲，则惩劝何畏乎不行？政教洽，则不殷忧而四海宁；惩劝行，则不勤劳而万人化。此由舍己而从众，是以事半而功倍也。臣又闻太宗文皇帝尝曰：朕虽不及古，然以百姓心为心。臣以为致贞观之理者，由斯一言始矣。（《策林·不劳而理》）

基于上述人心的向背关乎治乱的思想，他进一步尖锐地提出，人君能否去恶向善，修己安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他指出：“邦之兴，由得人也；邦之亡，由失人也。”但是，人心的得与失，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说，“人君不能顿为兴亡，必渐于善恶。善不积，不能勃焉而兴；恶不积，不能忽焉而亡。善与恶，始系于君也；兴与亡，终系于人也”（《策林·辨兴亡之由》）。在封建专制制度下，君主的地位虽然至高无上，却并不意味着可以不辨是非善恶，肆意妄为，其言动举措，终究要受到人心向背的制约。因为：

君苟有善，人必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归之。
归之又归之，则载舟之水由是积焉。君苟有恶，人亦



知之。知之又知之，其心去之。去之又去之，则覆舟之水由是作焉。故曰：至高而危者君也，至愚而不可欺者人也。圣王知其然，故则天上不息之道以修己，法地下不动之德以安人。修己者慎于中也，慄然如履春冰；安人者敬其下也，懔乎若驭朽索。犹惧其未也，加以乐人之乐，人亦乐其乐；忧人之忧，人亦忧其忧。乐同于人，敬慎著于己。如是而不兴者，反是而不亡者，自生人以来未之有也。（《策林·辨兴亡之由》）

为了引起君主的戒惧，唤醒其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在这里，白居易再次把修己安人的问题，提高到关系人心得失与国家兴亡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二）恕己及人，制欲禁奢

为了遏制君主贪婪奢侈的欲望，减轻人民群众的困苦，白居易在《策林》第二十一中，尖锐地提出了“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的论点。

他首先指出：“人庶之贫困者，由官吏之纵欲也。官吏之纵欲者，由君上之不能节俭也。”本来，以天下之大，人民之众多，物质财富之丰富，供君主一人享用，即所谓“以至多奉至少”，似应不至于“扰于人伤于物”。只是由于君主作为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必须豢养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况且，在聚敛财富的过程中，各级官吏层层盘剥，更何况整个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都依靠劳动人民来供养。这样，如果君主不体恤下情，制欲禁奢，而逞其嗜欲，横征暴敛，处于

